

白雲山房題畫

石
山

书画选集

湖南美术出版社

石鲁书画选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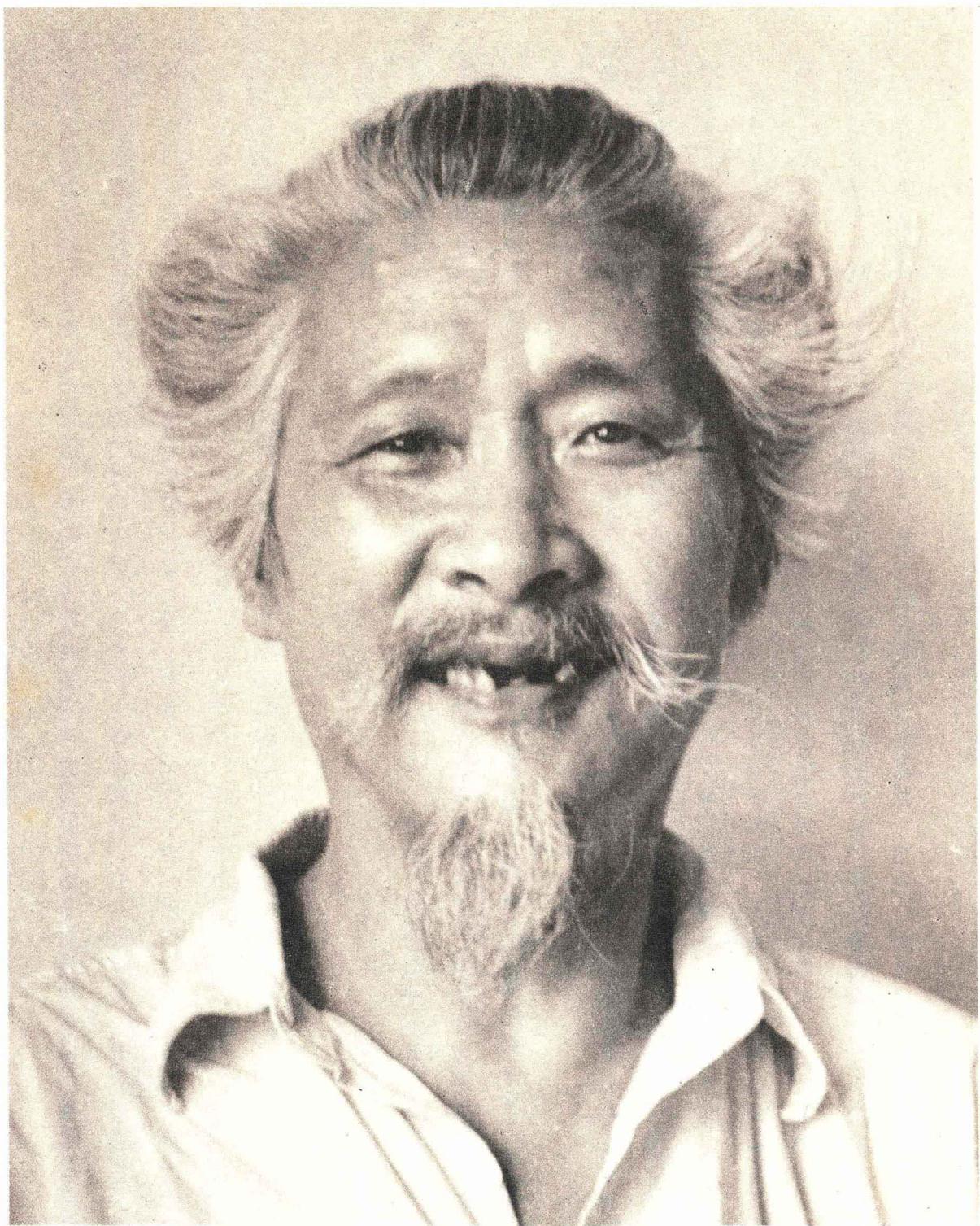
出版者：湖南美术出版社

责任编辑：萧大毅

(地址长沙市人民路十四号)

发行者：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刷者：湖南省新华印刷三厂
开本：七八七×一〇九二毫米 八开本 十三印张
一九八五年三月第一版 一九八五年三月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八二三三·七一八 定价：二十三元



石鲁六十三岁像

张文摄

艺道长青

一

石鲁书画创作的独特风貌，曾引起中外艺坛人士的青睐。但是，作为比较充分地介绍其艺术成就的个人画集，可以说至今没有被正式出版过。据我了解，有两方面原因：一，石鲁同志对自己所取得的成就，从来没有满足过，总是在不断向新的高度拼命探索着，总觉得还没有成熟，不愿意将『习作』性的东西拿出去拉扯出版社为其宣扬。出版单位主动找上门来，也是不愿多拿出作品：『不用着急，等以后有了好点的再说。』因此，在一九六四年以前，他没有出过个人画集，《埃及写生》与《国画选》，还是出版社动员和赵望云先生等的作品一块出的。二，因其画风独特，不落俗套，常遭世俗观点非议，一九六四年，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已经十分谨慎地编选出版了只有二十幅佳作的《石鲁作品选集》，刚发到新华书店，就因为一幅《转战陕北》犯有莫须有罪名，而被禁止发行，全部收回封存，版也毁掉了。直到粉碎了『四人帮』，才将少量未毁的廉价出售给极少数渴求者。石鲁同志一生没有看到他个人的画集正式出版、发行。

现在，湖南美术出版社以高度的热情，出版一本容量九十三幅的《石鲁书画选集》，这是一件十分令人高兴的事。约我撰写前言，我本来是不能胜任此要务的。但出于对石鲁这位良师益友的怀念深情，我也确实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想向读者说一些话。我不想具体评价和描述入选作品的画面；因为读者可以自己去看、去想。我想说些读者在画面上不一定能看清楚的事情，可能有助于较深刻的理解这些画面。

二

鲁迅先生早在一九一九年就说过，『美术家固然需有精熟的技巧，但尤需有进步的思想与高尚的人格』。一九二七年他更进一步说：『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赋得革命，五言八韵』，是只能骗骗盲试官的。』作为一个清代和尚的石涛，也早提出『笔墨当随时代，犹诗文风气所转』，和『一代一夫执掌，羚羊挂角门庭』的高见。石涛和鲁迅的革新艺术思想，对步入青年时代的石鲁，就起了启蒙作用。他原名冯亚衍，在二十岁参加革命队伍而需要改名换姓时，为了表达自己的艺术追求，才各取其一字，改名为『石鲁』。

石鲁同志是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出生于四川仁寿县文公乡松林湾冯家大地主家庭。这个家庭在他父辈时期，就逐渐败落。但琴棋书画、诗词歌赋之风颇盛，他弟兄几个也自幼受到民族传统文化和封建礼教的影响，十五岁以前，都在家读私塾。但是，三十年

代蓬勃发展的革命新文化运动，更强烈的吸引着他。一九三四年至三六年，他离开家随其兄冯建吴，到成都东方美专学习中国画。

一九三七年他当本乡小学美术、历史教员时，适逢抗日战争爆发，他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政治责任感，积极组织学生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和募捐活动。一九三八年在成都华西协合大学文学学院借读时，他又组织起华西历进学会，积极学习、宣传中国共产党和其他进步组织的抗战书刊，向往着中国革命圣地延安。一九三九年元月，他二十岁的时候，家里要给他完婚，拉他守住祖产。他为了寻找革命救国之道，摆脱封建家族的阻难，毅然只身骑了一辆自行车，翻越巴山秦岭，投奔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参加了革命组织，当即被分配到党在三原安吴堡办的青训班学习。后来，当同志们问到他地主家庭时，他也坦然地说：『真的，我家那院子，和《红楼梦》里的大观园差不多。可是我成了叛逆，偷跑了。』当他在『文革』中被诬为『反革命』，备受折磨时，也在充满慷慨激情的诗作中写道：『东廊无盗米，我生不为财，祖产我不守，婚配我不爱，当官太霸道，新科未必才，犹作诗章之穷命，先贤叫奇怪，才子佳人配，实在无闲情，不作浮云之富贵，打杀凶和豺。』正是这种不求名财富贵，而求革命真理，不畏权势霸道，而愿打杀凶豺，嫉恶如仇的性格，由热爱艺术，追求美的人生，走向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献身革命事业的光辉道路。

他在青训班学习半年后，被组织分配到山西第二战区民大前锋剧团任宣传戏剧股长。一九四〇年一月，晋西事变发生，阎锡山公开反共，他就回到当时党中央的所在地延安，入陕北公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注意研读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八月调入西北文艺工作团演戏。从一九四一年到四三年，他在西工团任美术组组长时，积极参加了边区军民大生产运动，又到党校三部参加整风锻炼。从一九四四年到四七年，在陕甘宁边区文协美术工作委员会工作期间，他又根据革命斗争需要，积极开展『新洋片』等美术普及工作，动员和组织群众投身革命战争和土改运动。一九四六年七月加入光荣的中国共产党。一九四八年，他先主编《群众画报》，后到延安大学文艺系当美术班主任，都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一九四九年他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时，年仅三十岁，却以革命史诗般的木刻新作《说理》和《打倒封建》，为新中国的艺术宝库增添了光彩。

从一九五〇年至一九六六年，石鲁同志在西安先后担任西北美术工作者协会副主任、西北画报社社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美协西安分会副主席、陕西省政协委员等职，积极带领广大美术工作者，坚持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地位；坚持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艺术道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同时，在一定范围内抵制了『左』倾和右倾思潮对文艺方针的歪曲。

特别是在史无前例的十年内乱中，石鲁同志虽然身受严重疾病的折磨和惨无人道的政治迫害，但他却能坚持一个真正革命艺术家、一个正直共产党员的原则立场，以大无畏的拼搏精神，笑对刀丛，直面人生，痛斥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罪恶行径，鼓动群众与反动、丑恶的势力进行坚决地斗争。一九六九年，他在所谓的『交代』材料中直言不讳地说：『我对江青的反对，集中在江

青的文化大革命旗手的地位与部队文艺座谈纪要上。我反对她的解放十七年来的文艺界被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的总估计』。『我把这论调在心中概括为专制主义的动向，所以，从思想上引起极端的反对』，他还义正词严地责问道：『党的许多老中央政治局委员怎么都一下子烟消云散了，而如江青、姚文元、张春桥怎么都选成政治局委员？我对他们的革命历史实在怀疑到极点！』『这些在历届中央选举中从未出名的人，怎么突然一下子高登龙榜呢？』他恨不得变成锤馗，将这些害人的魔鬼清除干净。于是，他在一首题为《打马过扬州》的短诗中写道：『锤馗打马过扬州，嫁妹不需吹鼓手，一日捉鬼三千万，抽尽黄泉水倒流。』他期望着把林彪、江青一伙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出于这种明确而强烈的美丑观、善恶观、真假观和敌我观，他没有作过一幅赞美『文革』《莺歌燕舞》的书画，而作的多是对人民困苦生活的同情《四川农妇像》；对『四人帮』的讽喻《逢场作戏图》；对延安革命生活的回顾《清青河畔草》；对祖国自然壮美的赞赏。《雪霁华峰》、《华岳松风》等；对劳动人民勤劳本质的赞美《黄河两岸渡春秋》等；对失散朋友的怀念《兰兮，兰兮，天各一方》等；对高洁人格的追求与表白《倒梅》、《荷风笑晚霞》等；在苦难中的呻吟与呐喊《黄菊重阳》、《夜风晓雨湿山花》、《寒江秋月了然身》、《沈霜花月听鸟啼》、《淡把清心当月魂》、《梦到天涯，仍是人家》等。难怪『四人帮』一伙，把这些书画统称之为『黑画』、『反动画』，要大加批判。因为这些作品等于在给他们敲着『丧钟』。

当我们党和人民粉碎了万恶的『四人帮』，党的三中全会完全拨正了进行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革命航向，石鲁同志的革命热情空前高涨，他不顾重病缠身，忍着病痛参加了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和美代会，草拟恢复和发展陕西美协工作的新方案，奋笔书画，讴歌《春到人间》的喜人形势。一九七八年他再次因肺病住了医院，但是并没有忘记他作为全国文联委员、全国美协常委、中国画研究院院委、陕西省人大常委委员、美协和书协陕西分会主席、省国画院名誉院长等职务带给他的社会责任，经常过问这些方面的工作。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当癌细胞已经在侵蚀他的生命时，他还操心着人民的疾苦，为支援洪水灾区人民而举办的书画义卖展览创作了大幅《荷花》。按石鲁的计划，病好后，他还要作十倍、百倍于已经做的工作，他已具体设想好重新改变他创作面貌的蓝图，以适应八十年代的改革潮流，作更大的艺术突破。但是，无情的病魔终于夺走了他为人民服务、为人类创造新的精神财富的机

会。一九八二年八月二十五日下午四时三十五分，一个非常富有创造性思维的大脑停止了思索，一颗为人民革命事业热血沸腾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卓越的人民艺术家、共产主义的光荣战士、敬爱的石鲁同志，在陕西省人民医院和我们永别了，终年才六十三岁。刹时，一切似乎都暗淡下来，只有墙壁上悬挂的《艺道长青》四个大字，放射着特殊的光芒。因为在他的艺术道路上，每一个脚印，都有着人民革命时代的生活和思想不断前进的标志。《生活之树长青》，深刻反映现实生活和崇高理想的艺术，也会是长青不老的。

的名字之一。以他为首的『长安画派』所开拓的美术创作新局面，将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里。他的《新与美》、《学画录》等美术理论著作，虽不能认为是非常完整、深刻的经典，但却为我国马列主义美学增添了新的血液。

由于石鲁同志襟怀坦荡，视野开阔，知识渊博，才华横溢，使他成为我国艺坛上的多面手；不是鲁迅先生批评的那种『空头文学家、美术家』。他精通诗词、文学。一九五四年他三十五岁时，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暴风中的雄鹰》，具有散文抒情诗的艺术特色，搬上银幕，博得好评，被接纳为中国作家协会首批会员，是美术界少有的文学家。他精通版画，四十年代在陕甘宁边区创作的木刻，《群英会上》、《妯娌俩》、《胡匪劫后》、《说理》、《打倒封建》等，以鲜明的时代主题和民族风格独立于版画之林。他精通群众喜闻乐见的年画，五十年代在西安创作的《王同志来了》、《幸福婚姻》、《古长城外》、《巧女绣花山》等，以构思的清新和典型人物个性刻画的深刻性，开拓了新年画创作的新领域。他尤其精通中国画，在探索社会主义时代中国画创新道路上，无论在人物、山水、花鸟、家禽等方面，树立了一个又一个艺术丰碑。一九五九年的《转战陕北》、《延河饮马》和六〇年的《东方欲晓》，开创了以传统山水画形式表现重大革命历史主题的崭新道路。而在六十年代前期创作的人物画《南泥湾途中》、《东海之滨》、《种瓜得瓜》、《逆流过禹门》、《赤岩映碧流》、《上工》、《采桑女》等，却开辟了人景结合、以神取形的没骨写意人物的新途径。他创作的《宝塔葵花》、《终南山下》、《春满秦岭》、《雪后园林》、《春雨初晴》、《江南冬景》、《家家都在花丛中》等，开拓了虽属『无人之境』，却充分表现了现代人高尚精神生活的山水画新路子。他的《秋高图》、《豆荚》、《金瓜》、《雨荷》等，也别开了花鸟画反映现代人民生活的新生面……所有这一切，都把我国中国画的创作水平，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使陕西的中国画在全国艺坛有如异军突起，声震中外。到七十年代，病中的石鲁同志面对『四人帮』的法西斯专政，为了表达自己和人民群众对反动势力的愤懑反抗情绪和追求美好生活的心愿，他又改变了以往着重写实的画风，采用了诗书画印配合默契、浑然一体，意理法趣凝于笔墨，谐谑痴狂蕴蓄衷肠，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大写意画风，为清代开创的『文人画』，打开了反映新时代特殊生活的广阔天地。不论他的《骄雪图》、《山鸣图》、《虎斗图》、《龟蛇图》、《荷雨图》、《峨嵋积雪图》，还是他的《华岳之雄矣》、《苍苍白月挂高松》、《雪中犹劲爱清风》、《梅花最喜漫天雪》等，都是借物抒情，赋诗言志，在强烈的石鲁个性中，表达了人民共性的佳作。石鲁同志还精通书法艺术（这一点还有人持以非议），他的书法创作与他的绘画一样，不拘形似，不泥家数，而重神韵、气势和自我感情地抒发，在无法中求有法，狂怪中求诚实，形式美中求情操美，为提高书法艺术的精神素质、意境高洁指出了门径。正因为石鲁同志在艺术上敢于不断革新，大胆创造，碰到种种误解和非议是在所难免的。尽管有人以『野怪乱黑』的贬词责难他的创新，但他有一个坚定的主张，这就是『生活为我出新意，我为生活传精神』。他说：『艺术创作上不断地追求新与美，不仅是艺术必须具有的独创性，而且是艺术反映生活的根本任务。』因此，人们把石鲁称为永不知足的艺术革新家。石鲁的艺术道路，是随着生活的发展，不断革新艺术创造的道路；这条道路，将使

石鲁同志在艺术理论研究方面的成就和贡献，并不亚于他的艺术创作实践。相反，正是因为他有科学的艺术理论思想的指导，加上他的勤奋努力，创作才有如此可喜的成就。几十年来，他写了许多艺术理论文章，而更大量的理论思想，则表露在他会上的发言，与同志们的交谈和为朋友的题画题词中。但无论是纯理性的论述，还是对具体创作问题的分析，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他始终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即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坚持了马列主义的美学原理。尽管有人给他戴过『主观唯心论』、『唯美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帽子，但实践证明，那至少是一种误解。

且看石鲁同志怎样运用唯物辩证观点，对待一系列艺术创作思想方面的问题：

比如在民族艺术传统的继承和革新关系问题上，他既反对否定一切传统的民族虚无主义，又反对墨守陈规的保守主义，而立足于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他说：『从艺术的规律来看，在形式与技法上也有相对的独立性与延续性。运用旧形式与技巧为新内容服务，求得艺术创造上的新发展，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有不可轻视的积极作用。……不是要无条件地搬用其旧内容，而重点还在于继承传统的艺术形式，特别是塑造形象的技法规律，以作我们创造的出发点。新内容与传统形式、技法的辩证发展，才能攀登艺术的高峰。』

又如在艺术性与政治性、思想性的关系问题上，他既反对艺术脱离政治和思想的偏向，又反对让艺术作政治概念和政策条文图解的偏向，而立足于从生活出发，用典型形象说话。他说：『教条主义不仅肤浅的规定艺术为政治服务就是作为具体政策的翻译和解释，而且根本否认了生活是文艺创作的源泉。它用政治思想代替艺术思想。教条主义者的无知，就是认为花就是花，政治就是政治，都是片面的主观主义。其实在艺术创作中，花可以是人，人也可以是花，一切美的艺术形象，都应该是现实的人的生活的反映。』而要『提高艺术作品的思想性，根本问题在于建立和巩固作者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只有不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才可能在客观现实的世界中真有所识，真有所感，真有所为，也才能真正提高艺术的思想性』。

再如对艺术创作中个性与共性的关系问题，他既反对缺乏个性风格的一般化创作，又反对缺乏共性的『自我表现』，『下意识冲动』，而立足于个性与共性的有机统一。他说：『敢抒真情，大胆发挥个性，是艺术创作不可轻视的因素。』但是，『任何时代，任何阶级，值得赞美的个性，都是部分代表着全体的意义。这个个性和共性不是对抗性的，而是共同性的个别化——强烈化。』『一个人的感情有限。只有当他代表了千千万万人的感情的时候，才有最大的发热力』。

还如在对待文艺创作中作者主观和所描绘的客观事物的关系问题上，他既反对纯客观的模拟生活对象，又反对纯主观的歪曲生

活对象，而立足于『物』『我』的有机结合，主观和客观的融化统一。他说：『一幅画的动人，我想还不完全是从不同角度获得的启示，而是「我」和「物」得到一致。所以我觉得不光熟悉对象，还要记住（或保持）自己当时的感受和感情。』『因为形象不是简单地起说明什么问题的象形作用，而是极为丰富的活生生的生活概括，同时也包括作者的品质和爱好特点，而构成一个完整的典型的艺术形象』。所以，他还指出，『偏于主观者以形象为符号，偏于客观者以形象为拜偶，皆不足取也。』他认为，艺术形象『当取于客观，形成于主观，归复于客观，故创造之过程乃为客观——主观——客观之式也。』

石鲁同志的这一系列艺术理论，都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前人艺术理论的一种创造性的继承和发展，有着深刻的实践意义。有些还是他艺术实践的新鲜体会和总结，有待我们进一步整理、研究。

五

在我们这样有十亿人口的大国，要对一个艺术家或一件艺术品取得完全一致的看法，不仅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必要的。何况世界上也没有一个完美无缺、天衣无缝的艺术家或艺术品。总都带有他所处的具体历史时代的相对局限性，这就要由别人或后继者的不断充实和发展。现在，愿意吸取石鲁同志经验而发展自己艺术创作的朋友越来越多，这个画集可望受到大家欢迎。但是学习石鲁同志的艺术，如果忽略他的政治立场、美学思想、人格气质、文化素养和性格特点，光摹仿他某些题材构图或笔墨技巧（这在开始是难免的），就标以『石鲁学生』或『长安画派』自足起来，那就未免太肤浅了。他给我们在荆棘丛生的西北黄土高原上，勘查出一条并不平坦的艺术之路，需要我们继续开拓前进。而不希望我们照着他的葫芦画瓢。因此，他总爱给青年朋友书写『艺道长青』、『艺道方长，新意为趣』、『穷目千里，更上一楼』之类的勉词。

我想起一九七八年初石鲁同志为日本一个书道访华团朋友题写的一副对联，作为此序的结语吧：

不经沧海难为水，重上青山更一峰。

叶 坚

一九八四年中秋于西安雪泥阁

图版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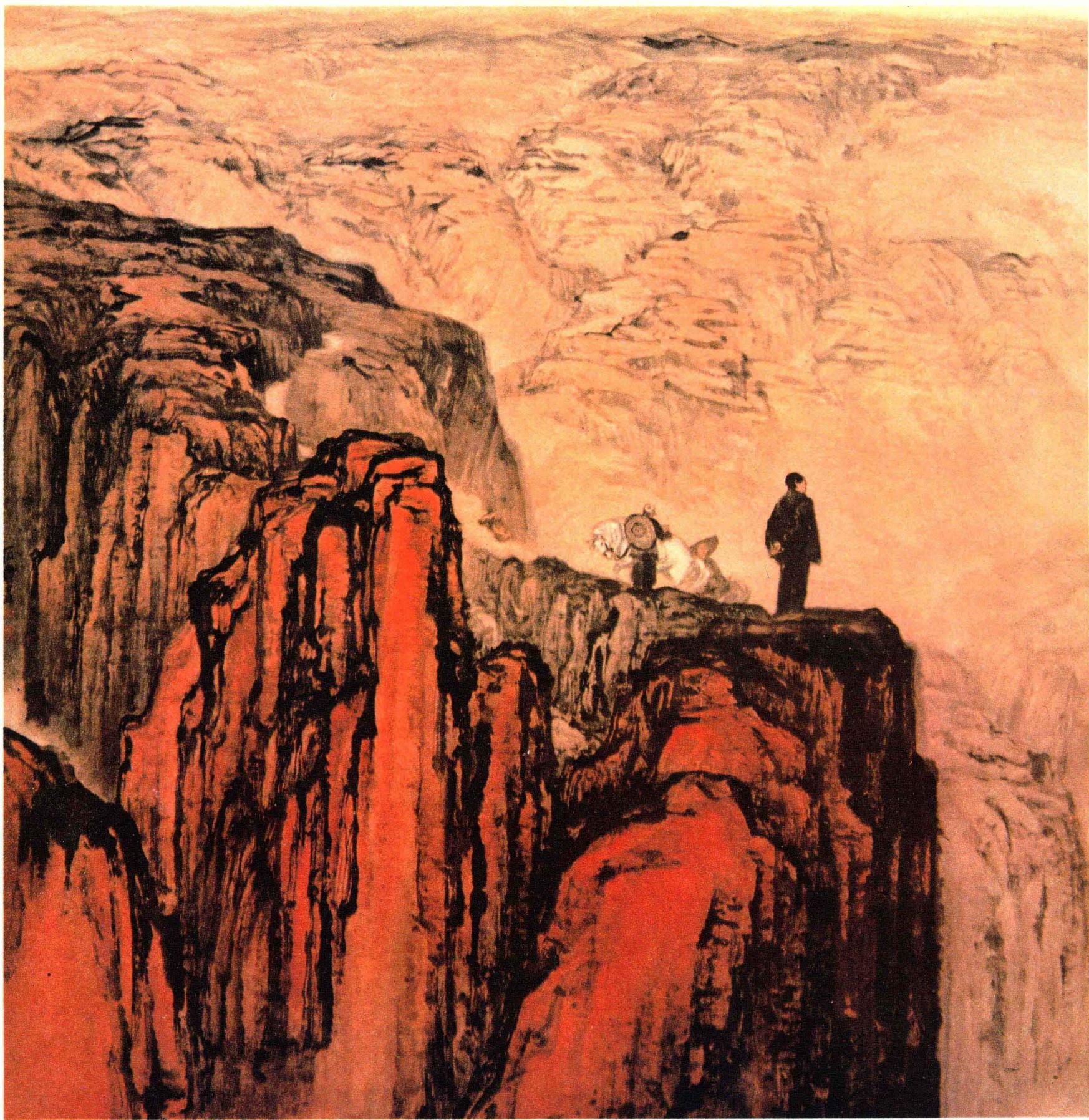
四二	柳荫深处	(一九七五年)
四三	逢场作戏	(一九六四年)
四四	华峰之雄	(一九七五年)
四五	幽兰宜人	(一九七一年)
四六	黄河两岸度春秋之一	(一九七一年)
四七	四川农妇	(一九七一年)
四八	黄河两岸度春秋之二	(一九七二年)
四九	雪霁华峰	(一九七二年)
五〇	石榴五月红如火	(一九七二年)
五一	竹石	(一九七二年)
五二	幽兰	(一九七二年)
五三	苍崖之兰	(一九七二年)
五四	五月石榴红似火	(一九七二年)
五五	黄花重阳	(一九七二年)
五六	雄秀之风	(一九七四年)
五七	自古华山一条路	(一九七四年)
五八	华岳松风	(一九七四年)
五九	桃锄春暖	(一九七四年)
六〇	梅林高士	(一九七五年)
六一	雪白飘砂红	(一九七五年)
六二	千里稻香百里荷	(一九七五年)
六三	高朋之秀色	(一九七五年)

胜利之果 (一九七五年)
摹大涤笔意 (一九七五年)

书 法

六六	艺道方长	(一九七一年)
六七	艺之始也	(一九七一年)
六八	纵马问苍天	(一九七一年)
六九	绘事载道	(一九七三年)
七〇	寿而康	(一九七四年)
七一	真理的标准只能是实践	(一九七五年)
七二	春到人间	(一九七六年)
七三	欲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	(一九七八年)
七四	大道当风	(一九七八年)
七五	业精于勤熟能生巧	(一九七九年)
七六	艺贵独创犹贵人品	(一九八一年)
七七	实事求是	(一九八一年)
七八	速写	一、二、三、四 五、六、七、八
八〇	速写	九、十、十一、十二
八一	速写	十三、十四、十五、十六

速 写



一 转战陕北 (1959年)

二 山林深处

(1958年)





三 南泥湾途中 (1960年)



四山径 (1960年)

五 春满秦岭 (1961年)

